



情况下，会议情况不可能立即公开报道，也自然不会传播世界。甚至，随着时光流逝，中共一大具体的召开时间、产生的具体文件等等，都有模糊之处了。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主任李颖研究员透露，1956年，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前往莫斯科，与苏共交涉，要求把共产国际档案中有关中共的部分交还中国。后来，在苏共交还的一部分档案中，中共党史专家有了重大发现，从中找出了中共一大文件的俄文译稿。之后，中央档案馆相关同志将翻译成中文的相关内容交给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同志。董必武阅后复信，“这三个文件虽然是由俄文翻译出来的，在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

李颖称，就在一年后亦即1957年，美国教授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注意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中有一篇1924

年1月的硕士论文，题目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该文附录几乎全文收录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由于双方信息隔膜，韦慕庭在当时声称自己是中共一大文献的第一个发现者。”李颖说。

无论如何，在韦慕庭发现中共一大文献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8年。这期间，无论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还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都震惊着东西方世界。领导这些胜利，取得这些成就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而从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使得第一次国共合作破产，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这22年，中国共产党通过枪杆子里出政权，终究又公开地、成建制地回到了自己初生的那座城市！1949年5月26日晚间，从南翔镇乘坐吉普车进发上海市区的陈毅等中共华东局领导，在圣约翰大学与中共上海党组织胜利会师。陈毅与此前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刘长胜、张承宗紧紧握手，对刘长胜动情地说：“哎呀，我们真担心你们的安全呀！”这担心岂是多余？据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1949上海解放日志》记载，光1949年1月至5月25日，在上海牺牲的地方烈士共计100人。其中既有李白、秦鸿钧、张困斋等“永不消逝的电波”，也有诸如郁姑娘这样的浦东人民解放总队区武装小组战士。在上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网站的烈士名录中，只记载了这样一点信息：“郁姑娘——性别：男；籍贯：南汇县；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六日在南汇县七灶港牺牲。”

这些烈士的牺牲当时并未得到广泛报道，不过，当时在上海的英文报刊对上海解放之报道，如今读来仍令人感觉当时上海正浴火新生。英文杂志《中国每周评论》（China Weekly Review，原名为《密勒氏评论报》）主笔比尔·鲍威尔（Bill Powell）甚至提前起草了社论。其中有这样的内容：“期望人民解放军的到来能标志着一个好时代的开始。中国人民终于能在这个新时代良政的治理下过上好日子。”5月27日上海解放，这一消息迅速登上国际各大媒体的头版新闻。上海解放当天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中有这样的报道：“虽然这些高楼大门敞开，但共产党士兵们却睡在人行道上。如果是‘赤佬’（指国民党士兵），他们就会闯进去，好像自己是这个地方的主人一样！”“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到任何有关人民军队不良行为的抱怨。”

然而，这些赞扬人民军队的报道，特别是英美一些媒体驻沪记者向国内发回的相关报道，竟然引起了其国内编辑的怀疑，甚至无端怀疑这样的报道是“审查制度的产物”。很快，驻沪西方记者对这些质疑给出了答复。美联社上海分社社长弗莱

